

燃烧的希望

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探

艾筑生 王蔚桦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燃烧的希望

——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探

序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杨成星

封面设计:艾筑生

燃烧的希望——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探

艾筑生 王蔚桦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4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5412-0747-0/I·244

定价:20 元

在丰硕沃土上的辛勤耕耘(序)

艾筑生 王蔚桦

1919年前后启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学革命，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历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师比肩而立，群星光彩夺目，它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直逼两汉、赶超盛唐。

在现代文学的大地上，时代的造山运动竟一下造就了若干座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只要提起他们，就会使人充满激情、恭崇备至——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还是丁玲、沈从文、艾青、田间、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夏衍、钱钟书……名单还可以开出许多，这些大师级的作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是一座座丰富、深邃、美丽、神奇的文学宝库，都值得研究者付出心血，而且确乎以一代学人之功也难以穷尽。

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已经数不胜数，成果十分辉煌。但也不必讳言，由于研究者自身的素养以及客观存在的种种干扰，所以我们研究工作中无论是课题选择或研究方法以至资料引用等等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单一化、狭窄化、模式化和教条化的倾向，甚至作者的语言辞汇也往往肖似，缺少明朗的个性风格。因而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仍然有待深入。

至于当代文学研究，由于距离切近，加以政治生活领域波诡云谲的影响，所以，深符文学规律而又切中肯綮的研究仍是人们翘首以待的。

贵州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比之全国的研究水平，虽尚有不少差距，但有志于此的贵州学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摆在我们面

前的这本论文集，正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绝大部分篇章都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而且不少论文还全文入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或被有关刊物转载，产生过积极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近年贵州文学研究者们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得失坦陈、切磋比较，当可有助于贵州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也正是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目的。

“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是本书的重头，收有论文 21 篇。鲁、郭、茅，以及钱钟书研究仍为重点，但选题、角度及研究方法显然都力求出新。如对鲁迅情感生活的探微（葛继红）、鲁迅“恶”的文学观的探究（石高立）、《腐蚀》在抗战文学妇女小说中的独特性（陈开鸣）都着力甚深，而《鲁迅为何把蹇先艾列为乡土文学家首名》（陈棻德）、《论茅盾的小说创作并非主题先行》（黄泽佩）也显然独有所见。至于对闻一多作品（张静琴）、朱自清诗论（赵昌伦）、俞平伯新诗（杨淑媛）的研究以及对贵州抗战文学的研究（陈锐锋）都是踏实之作，朱伟华的《从人物和语言看丁西林早期喜剧的思辩色彩》也选择了一个易为人忽视的研究角度并获得积极的反响。

“当代文学研究”（包括贵州文学研究）收有论文 13 篇，其中对余秋雨散文、对新潮作家陈染、林白小说的评论不乏新颖的见地。《杂乱而生动的风景——论贵州 80 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张劲）、《倾听高原的声音——对贵州新近小说的管窥》（高守亚）、《山地意识：宽泛选择与艰难超越》（吴学良）、《人生的阐释——李发模论·中篇》（张嘉彦）都有纵横排阖之势，抉幽发微之论，当能启人心智、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贵州文学创作的关注。而朱理敦的《浓墨重彩写南昆——评长篇报告文学〈征服天下第一险〉》贴近生活、体现积极的参与精神、跃动着时代脉搏。

在“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既有对本省民族作家苏晓星、刘荣敏、罗大胜、赵剑平新近创作评论的文章，又有对名家名作的研究。如：《透过苗族巫术看沈从文作品的价值》（洪燕）、《文化历史情结

与生命意识的探索》(丁润生)以及《浅谈彝族传统文化在吉狄马加诗歌中的表现》(柳爱江)等等。所有这些论文都力求克服习惯的模式,而努力从民族文化的底蕴、时代因素的制约、作家个性的影响及文学的内在联系诸多方面着手,探寻文学的真蒂。

“理论探讨”有对文艺方针政策的学习与研究(王文楷)、也有对当前文艺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思考(奔众);对“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的区别(申元初)及文学批评的本身建设(喻莉娟)研究者也显出思维敏锐与文风活泼。《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光荣传统》(徐明德)则高屋建瓴、理清脉落,指出具备健康的文化态度是建设发展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人们常说文学创作是寂寞的事业,而文学研究更要耐得寂寞。在商海风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在本省一直匮乏文学理论阵地的境况下,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的各位先生关注现实却又恪守书生品性,持平常心常伴青灯,握手中笔抒发心志,一直在默默地攀登、耕耘。

感谢各界人士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我们仍将努力,以不负大家的厚爱。

目 录

在丰硕沃土上的辛勤耕耘(序) 艾筑生 王蔚桦

理论探讨

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光荣传统.....	徐明德(1)
树立精品意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王文楷(10)
当前文艺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奔 众(18)
艺术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色	苑坪玉(29)
文艺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李世同(34)
小小舞台天地宽	苏 丹 孙凤岐(38)
——我省小剧场艺术的历程	
“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的区别	申元初(43)
走向新世纪的文学批评	喻莉娟(49)
冷冷热热说散文	王蔚桦(54)

现代文学研究

无情未必真豪杰	葛继红(64)
——鲁迅情感生活探微	
弱者中的强者	甘桂芳 邓训鉴(73)
——重议阿 Q 和阿 Q 主义	
论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	袁荻涌(83)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石高立(93)
——略论鲁迅“恶”的文学观	

革命友谊光照日月	左才慧(106)
——鲁迅和瞿秋白	
鲁迅为何把蹇先艾列为乡土文学家首名	陈菜德(111)
郭沫若与庄子	张顺发(116)
论茅盾的小说创作并非主题先行	黄泽佩(128)
《腐蚀》：抗战文学中独特的知识妇女主题小说	陈开鸣(141)
谈《春蚕》的写作艺术	黄鹏先(151)
闻一多幻想说新探	张静琴(158)
试论朱自清的新诗主张	赵昌伦(167)
略论俞平伯的新诗	杨淑媛(177)
从人物和语言看丁西林早期喜剧的思辨色彩	朱伟华(188)
林语堂爱国思想历程	左全安(199)
“卖草的女人”	胡赤兵(210)
——谈罗淑《生人妻》中的女主人公	
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学	陈锐锋(215)
幽默的意蕴	周帆(223)
——谈《围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人生与时代交会的审美空间	杨永贵(234)
——从抗战诗歌看现代诗歌的精神走向	
抗战诗刊钩沉	许家骅(241)
——谈《顶点》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几个版本问题	蔡军(248)

当代文学研究

散文：从“写什么”到“怎么写”	徐成森(257)
——兼论《文化苦旅》的文本意义	
“我写世界，世界才低着头出来”	谢廷秋(270)

——陈染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 智慧林白 徐佳音(280)
——林白小说作品漫评
美的情思 美的旋律 陈文先(285)
——浅谈贾平凹散文
一个特殊的群落：生命意识的怪异表现 杨 红(289)
——余秋雨散文一瞥
历史变革时期的创作心境探微 杜国景(296)
——兼谈萧也牧建国初期的小说
一条通向现实人生的理想之路 吴 凌(303)
——对郭小川诗歌的重新解读
生命不息的歌 雷 鸣(312)
——重读《郭小川诗选》

* * * * *

- 杂乱而生动的风景 张 劲(318)
——论贵州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
倾听高原的声音 高守亚(331)
——对贵州新近小说的管窥
山地意识：宽泛选择与艰难超越 吴学良(338)
——贵州西部高原派作家群创作随谈
浓墨重彩写南昆 朱理敷(345)
——评长篇报告文学《征服天下第一险》
人生的阐释 张嘉譞(348)
——《李发模论·中篇》

民族文学研究

- 透过苗族巫术看沈从文作品的价值 洪 燕(353)

- 民族文学增异彩 鞍家儿女沧桑情 艾筑生(362)
——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读《末代土司》
- 浅谈彝族传统文化在吉狄马加诗歌中的表现 柳爱江(369)
- 寻觅雅俗文学的结合点 安尚育(378)
——罗大胜创作刍议
- 从刘荣敏作品中的“老县长”看侗族审美意识 王继英(382)
- 赵剑平小说创作简论 王 刚(388)
- 文化历史情结与生命意识的探寻 丁润生(396)
——论张承志的创作
- 后记

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光荣传统

徐明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本世纪初世界文化大交流、大发展的时代，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把中国文化引向现代化开了先河；为使中国文化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进行了伟大的实践，形成了崭新的传统，准备了丰富的经验，可资继承和借鉴。

—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明清两代，呈现垂暮之象，且已僵化到严重束缚中国文化的更新，使之日渐走向挨宰割、被侵吞的泥淖和深渊。这种束缚在清末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尤甚，其表现有四。

第一，成熟于南宋、推行于明清，以三纲五常为其具体内容的封建伦理政治严酷地束缚着中国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清末有“中体西用”之说提出，然后反对之声蜂起，认为泰西之制不可学，而“人心思治，则舍我中国之圣教无由也。”^①又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维新变法，而传统的君权至上，法祖观念，乃至军事行动一涌而上淹没了这次改良。辛亥之后，虽然赶走了皇帝，却没有改造得了伦理政治，许多人口里不反对共和，但满脑子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一切言行带着君主专制的臭味，其结果是尊孔复古肆行，孙中山被逼让位，袁世凯篡权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上台，帝国主义入侵，割让土地，白银外流，反胜为败，丧权辱国。

第二，在伦理政治的支撑下，空想“以夏变夷”^②，不愿变于夷的排拒外来文化的守旧思想大行其道，助长了阿 Q 似的妄自尊大，鄙视外来的科学文化，甚至认为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古已有

之。李士粲就说：“不思此技术，原在吾儒复载之中”^③，阮元亦作如是说^④。其时，洋务运动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调，但只学其枝节，未能见到更新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中国终于未能制入侵之夷反制于夷，于是引起王闿运骂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这样的昏话来。

第三，反对发展现代商业贸易和建设现代工业。认为发展现代商业贸易会“胥天下为游民”，只有如“先王之治天下，使民终岁勤勤，而仅能温饱其身”，固穷自乐，安土重迁，才会使天下无游民而臻于“太平”^⑤。与此相呼应的，是反对发展现代工业。曾任清政府驻柏林公使之职的刘锡鸿认为开山、搭桥、修铁路，会使山神不安，惊动龙王河伯之宅，因此他反对在中国修铁路。见识过西方文明的公使大人尚持如此陈腐可笑之见，更甭说未出国门一步的衮衮诸公当属“乃不知汉，无论魏晋”者流了，他们自然不知道发展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的重要性了。

第四，由于以上三种原因，使中国广大学子在学术上不知世界近代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仍沉溺于治经，述而不作的封闭境界中；文学艺术仍是原道宗经、文以载道、桐城义法、八股程式束缚下的人仕敲门砖，隐循山林的咏叹调，为三纲五常说教，做伦理政治的传声筒，无非重复古人，了无生气；它已不能自我超越，遑论超越他人了。

总之，整个封建末世文化，已成为阻碍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而“强曳之逆向后行”的势力。“国人不惜流血牺牲以除此障碍矣”^⑥。于是，反对旧文化，开启新文化的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二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反帝反封建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终于爆发了。这场运动一开始，就针对中国传统文
化展开了坚决而全面的批判。陈独秀首先在《青年杂志》上发表
《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纲领，即著名的
“六义”。他说，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
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①。其中第一条是针对极
端地束缚着中国的伦理政治制度及其道德价值观而言的，第二条是
针对中国文化的内倾保守、封闭性格的知识价值观而言的，第三条是
针对压抑中国人的开拓超越精神及其群体人生价值观而言的，第四条是
针对排斥外来文化的闭关锁国传统而言的，第五条是针对重传统农业而抑制商业和轻消费的固穷自乐经济价值观而言的，第六条是针对传统的人本主义整体观的“天人合一”自然价值
观而言的。所以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
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如只“尊重 24 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
进之图，则驱吾民于 20 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沟中而
已。复何说哉！……吾宁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
民族，不适当世界之生存归消灭也”^②。这是关乎中国前途的一战，为
了使中国不象巴比伦似地被开除球籍，则须斗争、批判，方能前进、
生存。

新文化运动批判了封建伦理政治及其道德价值观。以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伦理政治从传统文化中异化出来，支配和桎梏着中国人
的手脚，所以必须“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
易以自由的、自治的民主政治”^③，最后由多数国民自觉和自动建立
自己的立宪政体和国民政治，以实现政治的觉悟。人民政治上的
真觉悟，必须自觉抛弃三纲五常等级制，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
人格独立的新道德，以保证民主政治、平等法律、现代经济的实行。
所以陈独秀结论说：“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
悟”^④。当时吴虞撰文揭露“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基”；鲁迅在

《随感录》中批判了程朱理学提倡的“节烈观”；周作人则在提倡“人的文学”时批判封建制度压抑人性的罪恶。

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传统文化的内倾、保守、封闭的性格与知识价值观。自来搞学术的人，盲目遵从古人，已养成学问上的奴隶主义。这传统来自儒家保守的知识价值观，它表现为：一不许横向借鉴。孔门弟子宰我学道家养身之学实行午睡，被斥为朽木；樊迟学农家请问稼圃的学问，被诬为小人。二不许怀疑问难。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告以不要违反孝，孟懿子仍不懂不敢再问；樊迟问孔子什么叫仁和智，告以爱人知人，仍不懂又不敢问。如此的封闭保守，代代相传，影响深远，易白沙批判曰：“是诚专制之尤者矣。”陈独秀批判说，“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艾，”中国如若不克服封闭、保守，不知更新，不善随“世界进化”而变化，将不能适应 20 世纪的世界环境之竞争，就会被淘汰。^①

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传统文化之压抑人的开拓超越能力。这是因于以上两点而发生的，于是有“朕即国家，朕即学术”的霸道主义，和保存国粹，只准述而不作，学术唯从周公孔子的作风。易白沙批判说，“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②但是“我国数千年来，思想统于一尊，故言经说则重师承，论学派别尊道统，……或有一二奇才异能，挺生于其间，稍生怀疑，欲发展其自由思想，世人群起攻之，诋为异端邪说，斥为离经叛道，终以囿于时尚，只得随波逐流，而无回翔之余地。”^③鲁迅说，“个人的自大”为“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④。于是他们呼吁，时人提倡“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为吾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两大信条，有敢蹂躏之者，吾侪认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以拥护之。”^⑤

新文化运动还批判了“慎夷夏之防”的排斥外来文化的闭关锁国传统价值观。本世纪初已是世界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如仍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国必衰亡。陈独秀指出，“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

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因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渐流所及，莫之能违。”^⑩“五四”的批判者们知道，中国是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的，古来的学术，是由儒学、九家（道法名墨等），同域外之学（印度佛教），三者混成的。继承这样的传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⑪他们也认识到，引进西方文化，必须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但是“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⑫以后鲁迅再论“拿来主义”，则是对“五四”时批判“明夷夏之辨”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还批判了传统的重玄虚论道之学而轻崇实厚生之业，和重农抑商轻消费的固穷自乐经济价值观。其表现为君子谋道而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儒家安身立命的第一格言。他们口头上讲善禹、稷耕稼，实则不答樊迟稼圃之问；孔门弟子子贡名为货殖，实以其便游说列邦，意在谋官；颜回名曰躬耕，安于陋巷箪食瓢饮，实盼明君起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与他及他的学生的行为相反相成，形成了轻实业，重玄虚，重官位，轻农商的传统，引导后人所向，与实际生活背道而驰。所以陈独秀说，“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惮于现实生活，吐弃殆尽。”因此他提出“生活神圣”的口号，指出尚虚文轻实业“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且易造成口头上的固穷自乐而实则贪鄙龌龊。^⑬

新文化运动还批判了传统的人本主义整体观的“天人合一”自然价值观和封建迷信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无不认识到，20

世纪“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诸科学法则，……—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只有提倡科学，才能破除迷信思想。当时，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整体科学哲学观与迷信思想混杂在一起，呈现种种不科学的表现，例如“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②这种传统直观的天人观与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观发生了碰撞，于是产生了把许多非科学的“鬼话”羼入科学中去的现象，把真的科学弄成非驴非马的伪科学。例如将儒道佛的宇宙观混入天文学中，做《三千大千世界图说》，或提出“偏重科学无宁偏重道法”之胡说。鲁迅指出，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只有依靠鬼话的对头——科学。^③

新文化运动在批判旧文体弊病的同时，进行了旧文学的批判和新文学的建设，因为文学是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要素。陈独秀指出，“欧洲文化，受惠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惠于文学者亦不少”，中国“今日革命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于是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④新文化运动“视文学为社会的条纲，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的方法”，“文学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是激励人复兴中国文化的感情，是宣传新文化的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工具。于是当时的文学革命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胡适首倡“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他提倡从“八事”着手，建立以白话为正宗的中国新文学。这正符合 20 世纪迅

速发展和普及的科学文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不仅用白话文写文学作品,还在于用白话文写作科学论文和应用文,以利普及。

第二,是周作人提出写“人的文学”的主张。他指出伦理政治统治之下将人的灵与肉割裂开,违反人性对美与善的要求,也就失去了真;主张重建一个崭新的能满足人性需求的文化,他说,“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的思想,”要用“人道主义的文学”把人们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人道主义的文学要写“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写自由恋爱的婚姻,写本于天性而非“三纲五常”的亲子之爱,才是表现崭新的人生境界和真善美统一的文学。^②

胡适的主张从文学的形式着手,周作人的主张从文学的内容着手,共同去创建新文学,是对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的实践,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于是才有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并呼唤出郭沫若等一千人的新诗;有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呼唤出茅盾、郁达夫、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小说;有胡适的独幕话剧剧本《终身大事》并呼唤出欧阳予倩等人的戏剧创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批判中国封建文化,“覆孔孟”,“铲伦常”,为创建中国新文化之开先河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还有许多不足,例如放弃了向民众普及新文化的工作,未能历史地辩证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系统清理,等等。这些任务还未来得及完成,由于国家濒临危亡,于是运动转向寻找一种制度来拯救中国的问题上来。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激烈碰撞,警醒了激进的战士们,民众也有了觉悟,对治疗中国文化的病瘤的症结有了新的认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蹶而欲振的压力达到极大的程度,于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建立一个能刷新中华文化的新社会制度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们发生了分歧。一部